从区域类型学构建汉语选择问的多路径演变*

李昕怡

提　要：选择问在东亚的东部、南部语言中多用连词连接选项，如汉语普通话使用“还是”，北部和西部则不然，其选项一般直接并置且各带疑问标记。汉语方言地处东亚语言过渡区，其内部选择问类型分异与上述背景有所呼应。语言结构的类型分布能反映其演变历史，东亚选择问的类型差异指明汉语选择问发展有三个关键步骤：（1）从句群转变为复句；（2）选项句内出现固定的前置性标记；（3）删除重复标记，只保留位于选项间的标记，选择问从并置式转变为连接式。选择问连词“还是”可追溯至疑问标记，该演变路径已被其他的前置性疑问标记预演。类型学对选择问多样性的发掘，不仅揭示了汉语选择问演变的多线脉络，还为特定句式的产生提供了类型学的解释。

关键词：选择问　类型学　还是　疑问句

〇　引言

汉语广义的选择问结构包含反复问和列项选择问，本文关注列项选择问，即在共同语里通常用“A 还是 B”结构表达的问句。汉语疑问句系统中，选择问一般视作独立的疑问类型（吕叔湘 1942/1982；丁声树等 1961；Chao 1968；朱德熙 1982；黄伯荣 1984；陆俭明 1984；等等），以袁毓林（1993）建立的汉语泛时疑问系统为例，列项选择问、广义是非问和特指问在汉语疑问系统里三足鼎立。[①] 汉语选择问拥有独立地位，很大程度归功于它具备独立的形式手段，与是非问、特指问相区别，李宇明（1997）和徐杰（1999、2001）甚至指出选择问的“还是”本身已是传疑标记。以上观点都表明汉语选择问已高度构式化，“还是”既连接选项，也传达疑问。

但跨语言来看，高度构式化的选择问并不普遍。Dixon（2012）指出一些语言的选择问形式并不固定，有的语言甚至不存在所谓的选择问，比如举例 Huallaga Quechua 语用连词连接两个是非问以表示选择问，很难视为独立句式。又如英语的连词 or 在选择问和陈述句中均可使用；or 在选择问里可以连接两个名词或谓词短语，但其深层结构是 or 连接了两个是非问（Pruitt and Roelofsen 2011）。[②] 汉语却不同于此：选择问采用“还是”，陈述句则用“或者”。正如赵元任（Chao 1968）最早指出的，汉语的“还是”仅表选择（whether…or），但不能表达替换（either…or）。和汉语类似的情况也见诸中国南方民族语（Luo 2013），在一些西欧边缘的语言里也有零星报道（Haspelmath 2004；Mauri 2008）。据笔者调查，在东亚语言里，此类选择问集中出现在东部和南部的 VO 语里，北部和西部的 OV 语则倾向采用构式化程度较低的并置结构。例如，日语选择问不使用连词，而是直接并置带有疑问标记的选项。这两种选择问在东亚形成了最典型的类型对立，而汉语地处过渡带，不仅在方言里涌现出多种选择问结构，而且其类型分布也呈现出地理上的对立和过渡。

收稿日期：2022-07-24；定稿日期：2024-02-22。

* 本文的写作得益于荣晶教授和张敏教授的指导以及蒋玉婷和郁孙豪同学的建议。匿名评审亦提出诸多关键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① 袁毓林（1993）指出，“广义是非问”包含了使用语调、句末语气词“吗”的是非问，反复问 VP-Neg-VP 以及正反选择问 VP+ 还是 +Neg-VP。

② 英语选择问里 or 在深层结构上连接的是两个是非问，所以选项各带重音且句末为降调，当句末变为升调时，整个问句容易被解读为针对 A or B 提问的是非问（Zimmermann 2000；Han and Romero 2004；Beck and Kim 2006；Pruitt and Roelofsen 2011）。

语言结构类型的地理分布能反映其历时演变的轨迹。回顾历时研究，汉语各历史时期的选择问句式已描写颇丰（梅祖麟 1978；李思明 1983；祝敏彻 1995；何亚南 2001；张美兰 2003；刘子瑜 1994、2005；刘开骅 2008；等等），但仍少见“串联式”解读。汉语选择问发展经历的多次变异，横向投射为方言里的多类结构，这些结构反过来也标记了纵向演变史中关键的转变节点，从中我们可串联出连贯的历史全景。

本文将从区域类型学的视角重新解读历史材料，讨论汉语选择问如何多线但不失连贯地发展，最终形成宏观的类型对立。基于 Li（2024）对东亚语言选择问的类型研究，本文首先讨论汉语选择问编码的特殊之处，发掘其演变史中的重要节点（第一节）；其次讨论汉语选择问发展的三个关键转变环节，解释汉语选择问为何会出现如今的类型分异（第二节至第四节）；最后，第五节总结区域类型学如何更新我们对汉语选择问演变史的理解。

一　从东亚语言选择问的编码类型看汉语选择问

1.1　东亚语言选择问的基本类型和汉语选择问编码的特殊之处

Li（2024）根据两个形式标准，如何标记选项和如何关联选项，对东亚语言的选择问进行分类。标准一区分出两类模式：a. 选项均被标记为疑问项，每一项都带疑问标记；b. 选项未都被标记为疑问项，要么只有一个选项带疑问标记，要么各选项所带的是非疑问标记，或者直接不带任何标记。标准二则区分出：a. 选项并置不使用连接项；b. 选项间有连接项。此框架下，东亚语言（含汉语方言）的选择问可细分为 6 类：[①]

表 1　东亚语言的选择问类型

选项的标记模式	选项的关联模式			
	并置选项	连接选项（按连接项类型下分）		
		连词	语气助词（疑问助词 / 非疑问助词）	系词
非均被标记为疑问项	类型 1	类型 3	类型 4	类型 5
均被标记为疑问项	类型 2	类型 6		

需补充的是，选择问采用“连接选项”模式，是指采用典型连接构式 [A+ 连接项 +B]，连接项不一定是语法化程度较高的连词。类型 4 和 5 所采用的语气助词和系词，因出现在构式的连接项位置而被视为连接成分。

在 Li（2024）的调查样本中（101 个非汉语语言和 100 个汉语方言），有些语言或方言不止有一种类型的选择问。尤其是汉语方言，受普通话影响几乎都能接受“A 还是 B”，[②] 部分方言的并置型和连接型选择问甚至允许自由变换。根据 Li（2024）的语料和分析，表 1 中的 6 类选择问结构举例如下：

类型 1

类型 1.1　选项前带系词

（1）ŋ̩i^{42} we^{22} muŋ^{22} ʈ^{h}a^{54} wu^{44}，ŋ̩i^{42} mɯ^{31} muŋ^{22} ʈ^{h}a^{54} wu^{44}？

是 我 去 找 他 是 你 去 找 他

“是我去找他，还是你去找他？”（松桃苗语）（罗安源 2005：213）

（2）你是吃米饭是吃面条？（章丘话）（赵学玲 2007）

① 展示分类的表 1 整理修改自 Li（2024）图 1。

② 在该调查中，若某方言材料仅记录了“A 还是 B”一种结构，那么这种方言的选择问就属于类型 3；若其材料还描写了该方言的其他选择问提法，甚至指出它们才是自源性结构，那么这些方言的选择问类型由非“A 还是 B”的结构来定。

类型 1.2　选项带析取助词（disjunctive particles），仅出现在非汉语样本

（3）niani　kiaməsə-lə　nə　laxasusu-lə　nə　ənə-ni?

3sg　city's name-loc　dis　city's name-loc　dis　go-imperf.3sg

"Does he go to Jiamusi or Lahasusu?"（Kilen 语）（Zhang 2013）

类型 1.3　选项带非疑问语气助词，仅出现于汉语样本

（4）a. 分开嘞合住嘞？（太原话）（李改样 2005）

b. 请姚木匠啊，李木匠啊？（宿松话）（唐爱华 2005：251）

这一类型集中出现在晋语区，所使用的语气助词有"也""来""嘞"和"哩"，它们也编码了时态信息，比如吴堡方言的"也"和"嘞"分别表达了将来时和现在进行时（邢向东、王兆富 2014）。其他方言采用的语气助词在功能上接近普通话的"啊"或"呢"，将选项标记为有待考虑的提议。

类型 1.4　选项不带标记

（5）maü^{2}　ta^{1}　kā^{1}　kāŋ^{2}　naü^{6}　kāŋ^{2}　kham^{5}?

2sg　will　go　middle　morning　middle　evening

"Will you go in the morning or in the evening?"（Assam 傣语）（Morey 2005：351）

（6）他唱的歌儿好你唱的歌儿好？（武乡话）（史素芬 2002）

这类结构在汉语普通话中也很常见，当选项短且语义对立明显时就会采用这类结构（例如"此事真的假的"）。不过一些晋语和中原官话方言使用这一构式的限制更少，如例（6），此类构式的独立性更高。

类型 1 选择问采用并置结构来关联选项，选项虽然都有标记但它们都未被标记为疑问项，选项之间的替换关系可以从析取助词（类型 1.2）、焦点对立（类型 1.1 和 1.3）、语义对立（类型 1.4）推知。根据标记位置类型 1 结构可记作 [A+x] [B+x] 和 [x+A] [x+B]。

类型 2

（7）naŋ^{51}　jɛ^{51}　ʒa^{51}　lu^{ʔ31}，ŋɔ^{51}　jɛ^{51}　ʒa^{51}　lu^{ʔ31}?

你　去　将行　呢　我　去　将行　呢

"你去还是我去？"（载瓦语）（朱艳华 2011）

（8）你还是吃干饭，还是喝粥？（哈尔滨话）（金美 2003）

（9）吃面 ma 吃米饭 ma？（乌鲁木齐话）（李文龙、万晓卉 2012）

类型 2 选择问采用并置结构，每一个选项都有疑问标记标注其为疑问对象。类型 2 在东亚非汉语里较常见，疑问标记多为后置性的疑问助词或者词缀。汉语方言中此类结构较少，调查样本中仅乌鲁木齐方言有记录，其他方言都采用前置性标记"还是"来标记选项。

类型 3

（10）m^{55}　vu^{44}　a^{44}ɕo^{44}　kɪ^{55}　vu^{44}?

你　去　还是　我　去

"你去还是我去？"（拉基语）（李云兵 2000：185）

（11）咸菜抑菜脯？（福州话）（甘于恩 2010）

类型 3 选择问在汉语中最常见的结构就是"A 还是 B"。一些南方方言有自源性的选择问连词，如"定是"（广州粤语）（彭小川 2010）、"故是"（闽北建瓯话）（江洁 2015）和"抑还是"（连城客家话）（项梦冰 1997）。

类型 4

类型 4.1　疑问语气助词做连接项

（12）na　　bir　　na　ka　bir?

you　strong　quest　I　strong

“Are you stronger or am I stronger?”（Dhimal 语）（King 2009: 283）

（13）你去呀吗我去呀？（岐山话）（吴媛、韩宝育 2016：384）

类型 4.2　非疑问语气助词做连接项（仅出现于汉语方言）

（14）a. 中午饭在家吃嘿出去吃？（昆明话）（作者调查）

b. 今朝去嘞明朝去？（苏州话）（李小凡 1998：127）

类型 5

（15）man^{1}na:i^{6}　ɕu$^{1/}$ət^{7}　ɕi^{6}　　ɕu$^{1/}$ɳi^{6}?

今天　　初一　还是　初二

“今天是初一还是初二？”（侗语）（梁敏 1980：58）

（16）来朝天晴是下雨？（义宁平话）（周本良 2005：268）

类型 4 和类型 5 可分别记作 [A+x] [B] 和 [A] [x+B]。一些方言，如晋语，这类单标记的结构和类型 1 的双标记结构（[A+x] [B+x] 和 [x+A] [x+B]）可自由转换。不过，南方有很多方言只采用单标记的类型 4 或类型 5，不使用双标记结构，很难在共时类型上将它们视为双标记结构的一种变体。因此，类型 4 和类型 5 在汉语方言中可以被视为独立的选择问类型。

类型 6（在汉语方言中不作为固定构式使用）

（17）Bügün　kel-ä-m-siz　yaki　äti-mu？

今天　来NPST-Q-2sg　还是　明天-Q

“您今天来还是明天来？”（维吾尔语）（力提甫・托乎提 2012：368）

（18）你吃面吗？还是吃饭？（汉语普通话）

以上 6 类选择问在东亚地区的分布详见 Li（2024）提供的地图。从选项的标记模式看，选项均被标记为疑问项的类型（类型 2、6）集中出现在东亚北部和西部的 OV 语区，而选项未均被标记为疑问项的类型（类型 3、4、5）分布下移至南部，这一地区 VO 语序占主导。与之呼应，北部和西部的 OV 语区倾向直接并置选项，而南部地区倾向连接选项。桥本万太郎（1985）、Comrie（2007）主张东亚在南北方向上存在两个对立明显的语言区域，选择问的类型分立也体现了这一格局。其中类型 2 和类型 3 分别代表了最典型的北方型选择问和南方型选择问，其他四类非典型结构在非汉语样本里占比较少，但在汉语区却大量涌现，这或许和汉语地处两大分立的语言区域之间有关。

东亚语言的基本类型对立为汉语选择问的编码多样性提供了阐释空间。汉语区也存在选择问类型对立：并置式集中在北部，尤其是晋语区（类型 1），使用连词的连接式则集中于东部和南部（类型 3）。和东亚非汉语相比，汉语选择问有以下特殊性：（1）汉语区最多见的并置式是类型 1 而非流行于东亚其他地区的类型 2；（2）类型 2 在汉语方言里几乎都用前置标记“还是”，使用后置标记的仅乌鲁木齐方言有记录 [例（9）]，而在非汉语样本里类型 2 绝大多数使用后置标记；（3）类型 4 具有混合性特征，使用连接式，但连接项却是后置性标记，分布于南北两种选择问类型过渡的中部地区，在汉语区分布尤广；（4）类型 6 不是汉语主流，汉语区的选择问构式化程度较高。以上特征是如何产生的？这是研究汉语选择问演变史需关注的问题。

1.2　从汉语选择问的类型特征看其构式化经历的关键阶段

共时对比方面，东亚语言 6 类选择问的构式化程度由低到高可分三级：类型 6< 类型 1、2< 类型 3、4、5。其结构对比总结为（19）所示：

（19）QA?（+ 连词）QB? → [A+x] [B+x]?/[x+A] [x+B]? → [A+x] [B]?/[A] [x+B]?

第一阶段，选择问须通过连接多个问句来表达，每一个选项句都包含了一个独立的问句。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最关键的转变是句群变为了整句，先前独立的问句变为了提出选项的分句。

第二阶段，两个松散的问句被整合进一个句子单位，选项均带有标记。在第二阶段参与整合的句群有两类，第一类含有后置标记，第二类则用前置标记，分别整合为[A+x] [B+x]和[x+A] [x+B]。后置标记，如疑问语气词，在上古汉语里很常见，相比之下，句群中出现前置性标记很值得关注。汉语最常用的选择问连词“还是”就是一个前置性连词，此外方言中的类型5选择问[A][是+B]中的“是”也是前置性成分，因此，使用固定的前置性标记，是选择问演变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步骤。

到第三阶段，[A+x] [B+x] 和 [x+A] [x+B] 进一步紧缩为 [A+x] [B] 和 [A] [x+B]。[A] [x+B] 中的 x 由于占据了 VO 语中典型的连词位置，因此能进一步语法化为连词，这正是“还是”的发展路径。东亚南部的诸多语言的选择问也采用了 [A] [x+B] 模式。相较之下，[A+x] [B] 结构（类型 4）则集中于东亚的中部，它是南方常见的连接式，但连接项是后置性成分，选择问出现后置性标记更常见于北方型的并置式结构。历时研究需要解释是什么因素导致汉语区大量出现类型 4 结构的。

综上，从汉语共时的选择问类型特征来看，其发展历史至少经历了三个关键阶段：a. 将选择问句群整合为整句；b. 选项句中出现固定的前置性标记；c. 删除重复出现的标记，仅保留位于选项间的标记，选择问从对称标记的并置式转变为单标记的连接式。总结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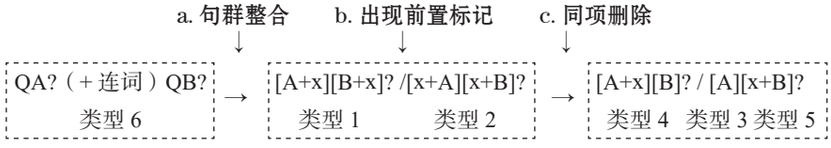


图 3　汉语选择问发展的关键环节对选择问类型的塑造

下文第二节讨论 a 环节，发生在上古到中古汉语的转变期。第三节关注 b、 c 环节，分别讨论从中古到南宋前置性的标记“为”类和“还”“还是”为何能够进入选择问构式，以及后续单标记型选择问的产生。第四节讨论具有混合性特征的类型 4 的产生过程。

二　汉语选择问从上古到中古的发展：从句群向整句的转变

上古中早期的选择问是通过组合多个是非问句来实现的（梅祖麟 1978；祝敏彻 1995），如例（20）；其中更常见的结构是直接并列的两个问句，如例（21）。

（20）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论语・学而》）

（21）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孟子・梁惠王下》）

例（21）这类句子尽管语法化程度很低，但其格局接近如今东亚北部语言的选择问，即“并置式 + 对称后置标记”的模式。尽管有时会使用连词，根据梅祖麟（1978），除“抑”以外还有“意”“将”“且”“其”“妄其”等，但这些连词并不固定专用于选择问，不同于“还是”。

句群整合首先要让独立的句子成为相互关联的分句。早期汉语选择问由多个独立的是非问组成，这些是非问都带有句末疑问语气词，每一个语气词标志着一个句子的结束，因此早期选择问实际采用的是句群模式。当句群内具有单句分隔效果的句末语气词减少时，这些独立的句子便有可能被视为共同表达选择关系的分句。《睡虎地秦墓竹简》里已经出现了前句问句不使用语气词的选择问（刘开骅 2008），如例（22）；到上古汉语晚期，《史记》里甚至出现了语气词全部脱落的例句，如例（23）。

（22）妻有罪以收，妻媵臣妾、衣器当收，且畀夫？（《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引自刘开骅（2008）]

（23）问伍被曰："汉廷治乱？"伍被曰："天下治。"（《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刘开骅（2008）根据例（22）推测关联词的使用会促使语气词脱落，理由是关联词表明了选项关系，所以选择问的构建不再依赖是非问。但这一推论较难解释：为何之前上古汉语选择问的关联词和语气词一直可以共现，直至秦才开始功能竞争？语气词的脱落可能另有他因。从构式化的视角看，随着是非问句群，尤其是以（21）为代表的形式频繁使用，选择问有了固定表达模式，即直接并置是非问，选择问功能逐渐被规约于该结构。由于该模式逐渐被整体地、轮廓性地认知，内部成分进一步模糊，省却疑问语气词也不影响选择问的表达。即便不把每个选项分别放进有明确句末语气词的是非问，也能识别它们是被提问的对象。

中古时期，选择问语气词逐渐脱落，有些选择问结构还保留部分语气词，如例（24）和例（25）；无语气词的日渐增多，如例（26）。

（24）"周公知其畔而使？不知而使之与？"曰："不知也。"（《论衡·知实篇》）

（25）如来大觉于菩提树下觉诸法时，觉悟施戒也，更悟余法？（《阿育王传》）

（26）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世说新语·政事》）

语气词的删略并非随机，前一选项句的语气词更易脱落。何亚南（2001）考查《三国志》，发现如果只保留一个语气词，则大多数保留的是后一分句的，刘开骅（2008）根据九种中古文献也观察到相同趋势。何亚南认为如果视选择问为一个整体，那么整个句子的疑问义主要由句末语气词传达，如此一来，前句的语气词由于处于句中而变得冗余，更容易脱落。我们同意将选择问视为整体结构会促使语气词脱落的观点，但前句语气词更易消失或许不完全是因为其传疑功能冗余。从构式化进程看，选择问在早期发展的总趋势是将句群转变为一个整句，各个独立问句会变成关系更紧密的分句，脱落前项句的语气词有利于减弱句子单位的分离感，促进整合句群。刘开骅（2008）也指出语气词的脱落使选择问"更紧凑简洁"。中古时期语气词脱落最迅速，刘开骅观察到此时前后选项句均不出现语气词已是主流情况，保留两个语气词的情况已较少。

以往研究都提到语气词脱落是选择问在中古时期发展的重要一环（梅祖麟 1978；祝敏彻 1995；刘子瑜 2005；何亚南 2001；刘开骅 2008），但如今汉语北部方言，尤其是晋语，选择问依旧使用成对的语气词（即类型 1 选择问）。类型 1 所使用的"嘞""哩""呀""呢""啊"等，都不是是非问句末语气词（郭利霞 2015），它们可以出现在句中位置，这保证了选项句至少不会被视为两个独立问句。历史上是否发生过句末语气词的替换，在上古和中古的文献里较难找到完整证据，但这至少说明除了删减语气词，使用非句末疑问语气词也有利于关联选项句，选项句更容易被识解为共同表达选择关系的两个分句。

在选择问句群紧缩的早期，直接并置选项的 [A] [B] 结构已出现，如例（23）。类型学上，这是汉语的一大特征，在东亚语言样本里，在汉语之外仅有印度阿萨姆邦的台语有记录使用 [A] [B] 结构（Morey 2005）。这种零标记选择问的使用很受限，如例（23）中"治""乱"意义互斥，选择关系凸显，此外它们形式简短，易被整合在一起。零标记选择问直至清代文献依旧可见，在如今的汉语方言及共同语里仍广泛使用（例如"这件事情真的假的？"），它的稳固性或许反映了汉语某些更基本的类型特征——同义成分的并列构式具有较强的能产性，比如使用正反问、具备一大批同（反）义素复合词等。

三　使用前置性标记的选择问的产生和发展

上古汉语选择问在类型上接近"并置式 + 对称后置标记"，到了上古汉语晚期和中古时期，选择问将出现固定的前置性标记，随着语气词逐渐脱落，进一步出现"并置式 + 对称前置标记"结构，这将推动选择问的类型分化。尤其是，一部分前置性标记会被重新分析为连词，类型 3 选择问（[A] [连词 +B]）由此产生，

它不仅在汉语南方方言里是主流，[①] 也是东亚最典型的南方型选择问。

3.1　中古时期“为”类标记在选择问中的出现

梅祖麟（1978）认为汉语选择问类型格局在中古时期初定，证据之一是出现了使用前置性标记“为”的句式，如例（27）（28），梅祖麟指出这正是现代汉语使用“是”做标记的选择问的来源（类型 5）。此外，还有复合型的“为当”“为是”“为复”，如例（29）（30）。

（27）如是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为意系法耶，为法系意耶？（求那跋陀译《杂阿含经》，《大正藏》，Ⅱ，60b）[引自刘子瑜（2005）]

（28）以何等故事不宜尔，为以姓望，为以财货耶？（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经》，《大正藏》，Ⅱ，660a）（同上）

（29）昨夜光明，殊倍于常，为是帝释梵天四天王乎？二十八部鬼神大将也？（支谦译《撰集百缘经》，《大正藏》，Ⅳ，230）（同上）

（30）诸僧尼常听涅经，为当曾闻此说？为当不闻？若已曾闻，不应远背？若未曾闻，今宜忆持佛经中究竟说……（《全梁文》）（引自 CCL 语料库）

尽管梅祖麟一开始将这类“为”视为系词，但又说“为”能用作假设词表达“如其”，所以可以在选择问里引出假设的选项。梅祖麟（1978）、刘坚等（1992）都类比上古汉语选择问的连接词“抑、将、且、其”来解释“为”为何会出现。但且注意，中古时期的“为”在选择问里经常同见于前后两个选项，不同于常出现在选项句中间的“抑、将、且、其”，类比它们还需谨慎。

从选择问发展的历史连贯性来看，“为”能用于选择问首先是由于它可以出现在是非问中，毕竟并置是非问句是早期汉语表达选择问的最重要途径。梅祖麟（1978）和刘坚等（1992）都注意到此时出现了含有“为”的是非问，如例（31）和例（32）：

（31）汝意云何，为欲归不？（竺佛念译《出曜经》，《大正藏》，Ⅳ，691b）[引自梅祖麟（1978）]

（32）……主人曰：“郭云此葬龙耳，不出三年，当致天子。”帝问：“为是出天子邪？”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问耳。”（《世说新语·术解》）[引自刘坚等（1992：255）]

“为”在是非问句首引出一个判断，人们询问所作出的判断是否正确，这可视为“为”系词功能的延伸，即把一个判断系连到对话主题上。柳士镇（1986、1992）、李崇兴（1990）、杨如雪（1998）、张美兰（2003）和何亚南、张爱丽（2004）都将中古选择问的“为”分析成系词——“为”在问句句首不传疑，而是起判断作用。其中一个证据是“为”所在的部分问句还同时使用句末语气词，如上文例（27）—（29）。

是否要为选择问里的“为”新增义项或改变词性？恐怕很难对历史文献做句法测试。但换到现代汉语语境，问句“你是吃米饭是吃面条？”里，“是”变成疑问副词了吗？表示“假设”还是“抑或”？直觉语感或许不会驱使我们做更多分析——“是”依然可以是判断词，它识别一个可能的答案，甚至说它是语义更虚的焦点标记。“是”可以在一系列潜在可能性中辨识（identify）焦点项（Zhan and Sun 2013）。同理，中古汉语的“为”也具有相同的辨识、聚焦功能。“X为A？X为B？”中“为”通过判断X可能为A，或可能为B，提出两个选项，“为”不需要添置新的功能才有资格进入选择问。这也是梅祖麟一开始将中古汉语选择问的“为”分析作系词的原因，他认为后来“是”替代“为”成为主流系词，[是A][是B]型选择问由此产生。“为”还将各选项标记为疑问的焦点，选项间形成对比。下文例（33）中，前一个“为”是判断词，后一个“为”则兼具判断和标记焦点两种功能。

① 虽说类型 3 选择问在汉语南方方言里占主导，但“A 还是 B”可一直分布至北部（东北地区），这也是东亚语言中类型 3 选择问分布的最北端。这和汉语普通话的性质有关，普通话混合了北方和南方方言特征，并不是典型北方方言（胡明扬 1987；林焘 1987；Norman 1997）。

（33）谢承记孚字及本郡则与琼同，而致死事乃与孚异也，不知孚为琼之别名？为别有伍孚也？盖未详之。（《魏志·董卓传》注）[引自何亚南（2001：194）]

去掉“为”后，选择问依旧能成立，但使用“为”的微妙差异在于它能把选项句关联到同一个疑问主题上，重复例（27）—（30）部分句子如下，它们可变相阐释为“疑问主题——为答案1？为答案2？”句组：

（27’）意法的关系是？——为意系联法？为法系联意？

（28’）以何等故事不宜？——为姓望？为财货？

（29’）昨夜光明的原因？——为帝释梵天四天王？为二十八部鬼神大将？

（30’）诸僧尼常听涅经，对于此说——为曾闻此说？为不闻此说？

从选择问演变的历史全局看，对称出现的“为”将选项系联在同一主题上，选项共同回应疑问主题的聚合关系被显性编码。此外，“为”的固定出现也增强了选项句之间的形式呼应，使得它们更容易被识别。总之，中古时期选择问的构式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对问句群模式的依赖度降低，这也呼应了刘开骅（2008）的观察：“为”在选择问中的普遍使用和语气词的脱落几乎是同步展开的。在这一历史阶段，汉语选择问出现的“并置式+对称前置性标记”结构，可视为如今方言选择问类型1.1 [是A] [是B]的原型。

“是”至晚到西汉末年成为系词（王力 1937），而最早在东汉佛经译本中，“是”就被用于选择问（何亚南 2001），如例（34）“为”“是”对应，更清楚地表明二者的可交替性。根据CCL语料库，“是”初期（六朝）进入选择问时，更多是以“为是”的复合形式出现，到晚唐《祖堂集》，[是A] [是B]才频繁涌现，如例（35）“是”引出谓词成分短语，和现代汉语方言[是A][是B]式选择问已无异。

（34）顷承释子，端坐六年，道成号佛，为实尔不？是世所美乎？（《中本起经·度波斯匿王品》）

（35）沙门行与行李处是一是二？（《祖堂集》卷16）[引自张美兰（2003：223）]

3.2　使用“为”“是”的单标记连接型选择问的产生

使用单标记连接选项的类型3选择问是东亚南部语言的代表性选择问，也是汉语目前最主流的选择问类型，这一结构的产生标志着汉语选择问来到演变的关键节点。含有“为”类标记和“是”的选择问在历史上都产生了单标记连接式，但它们的发展路径迥异。双音节的“为复”“为当”的演变路径将在后世出现的“还是”上重演，而“是”的演变尚未在历史材料里显示出相同的趋势。

中古时期只使用单个“为”类标记的选择问的例子如下：

（36）今依例应拜世子，未详应以铣为世子？为应立次子锴？（《宋书·礼志》）

（37）郗重熙与谢公书，道：“王敬仁闻一年少怀问鼎，不知桓公德衰？为复后生可畏？”（《世说新语·排调》）

（38）君往者为王府君论怪，云老书佐为蛇，老铃下为乌，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贱乎？为见于爻象，出君意乎？（《魏志·管辂传》注引《辂别传》）[引自何亚南（2001：194）]

例（36）（37）保留了后选项句“为”类词，例（38）则保留了前项“为”。以往研究或多或少都认为前两例的“为”类词具备了连接选项的功能，或许因于“为”类词出现在汉语连词的常见位置，表达选项关系的功能就规约到“为”身上。这类推测很少讨论“为”类词从多个到单个的转变是怎么发生的，“省略”很容易被当作自然发生的现象。从语法化角度看，需要找出“为”类词得以被分析成连接项的过渡语境。

根据CCL语料库的搜索结果，中古历史文献中共有“为”类选择问33例，其中23例是双标记结构，11例是单标记结构。单标记结构中，保留前一项“为”标记的3例，保留后项“为”标记的8例，这8例句子的“为”类词处于连接项的位置。在这8个句子中，6个句子共享同一特征：第一个选项句都嵌套在“未详”“不知”之后，如例（36）（37），实际上是一个间接疑问句，第二个选项问句则用“为”“为复”引出。这样的结构一方面满足并列两个是非问表达选择问的传统要求，另一方面，处在第二选项问句首的“为”“为复”亦可被视为连接项——承接前一问句，提出第二种选项让人考虑。

在初期，使用“为”类标记连接选项存在限制。根据语料库，六朝后，尽管出现了更多无须借助间接问句的选择问，但主要分布在两种语境：第一种语境以例（39）（40）为代表，前后选项对比的是数量或程度的多少，“少”（“唯”“只”）和“多”（“尽”“更”）的语义对立内在于这两个概念，即便离开语境对立也存在；第二种语境以例（41）为代表，后选项是前选项的否定项，这一语义对立同样是内在的，由自然逻辑决定，不是在语境中临时产生的。与之相比，双标记的选择问则无以上限制，可以提出在语境中才偶然成立的对立项，如例（42）。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可单用的“为”类标记均为双音节的“为复”和“为当”，和单纯的系词“为”已有所区分。至此可得结论：可以被视为连接项的“为”类词，最初往往出现在选项间有内在语义对立的语境里，这一语境中选项的替换、选择关系容易被推知。

（39）病者唯公一个，为复尽皆如然？（《敦煌变文集》卷 4）

（40）上座又问：“上来密语密意，只有这个，为当更有意旨？”（《祖堂集》卷 2）

（41）今日报慈同于古人，为复不同于古人？（《祖堂集》卷 13）

（42）从得饭已来，母子更不相见……为当坠于地狱，为复向饿鬼之途？（《敦煌变文集》卷 6）

反观“是”，单标记连接型的[A][是B]出现频次非常低，《祖堂集》仅1例，《朱子语类》仅3例，而双标记的[是A][是B]比重最显著（《祖堂集》16例，《朱子语类》58例）。《朱子语类》含有“是”的选择问有相当一部分以[是A][抑B]和[是A][或B]形式出现。这种句式的使用不是偶然，从上古汉语开始，在两个选项句间添加“抑”等表同类替换的词并不罕见。[①]另一方面，这类句式表明“是”与“为复”“为当”相比，更单纯地保持了提出判断的功能。与之对应，类型学调查显示，在18个使用系词作选择问连接项的方言中，有11个方言记录其选择问也可以有[是A][是B]模式，这说明[A][是B]在多数方言里更有可能是双标记模式的变体。[A][是B]中“是”不似“还是”具有专职的连词功能，它只是在连接型构式中被赋予连接项的角色。

3.3　选择问连词“还是”的产生

“为复”“为当”在晚唐发展出了连词功能，但却未能保留在共同语里，[②]不过它们的演化路径将在“还是”上复现。

“还”在《祖堂集》开始进入选择问，但用例极少，且尚未发展出连词功能，如例（43）—（45）：

（43）长庆举似保福。保福拈问长庆：“只如上座道‘不逐四时雕’，与摩道，还得剿绝？为当不得剿绝？”庆云：“争得剿绝？”（《祖堂集》卷 11）

（44）祖意与教意还同别？（《祖堂集》卷 19）

（45）古人还扶入门？不扶入门？（《祖堂集》卷 11）

从汉语选择问的发展路径看，“还”出现在选择问依然可用“并置是非问表达选择问”来解释。在疑问句中使用“还”的确在晚唐至南宋的文献里较为凸显，“还”可出现在是非问（“还 VP 摩 / 乎 / 耶？”“还 VP？”）、反复问（“还 VP 也无？”“还 VP 不 / 否？”）以及特指问。

“还”为何成了疑问句的固定句首成分？叶建军（2008）指出“还”最开始出现在是非问结构时，依旧表示“又，复，仍然”，即询问前文的某一情况是否依旧保持 [例（46）]。之后出现了两解情况：若语境能推出旧况，“还”作“仍然”解读；若不能推出旧况，那么 “仍然”义就不再明显 [例（47）]。发展到最后，“还”引出的问题不再与前文旧况对比 [例（48）]，“仍然”义就不再凸显。不过叶建军（2008）例句中的“还”都不是疑问标记，因为这些问句句末都有“否”或“……也无”：

① 如今一些闽语或者客家话采用“抑是”“抑还是”作为选择问连词，如漳州话（黄淑芬 2008）和连城客家话（项梦冰 1997）。

② 根据笔者调查，仙游方言的选择问连词为“复是”，或许继承自“为复”。

（46）不知支机石，还在人间否？（岑参《严君平卜肆》，《全唐诗》卷 198）

（47）更与师到佛殿，见雀儿在佛头上放粪。相公问："者个雀儿还有佛性也无？"师云："有。"（《祖堂集》卷 15）

（48）问："与摩来底人，师还接也无？"师云："接。""不与摩来底人，师还接也无？"师云："接。"（《祖堂集》卷 18）

与此同时，句末无其他标记的"还–VP"疑问结构也出现 [例（49）（50）]，刘坚等（1992）认为这由省略语气词而来，后者在方言中保留至今 [例（51）（52）]。此处无须疑问语气词，"还"也无"仍然"义，已是纯粹的疑问副词（张敏 1990、2013）。郭锐（2008）分析了"还"的多义结构（恢复、重复、延续、保持底线、反预期、状态终止等），其共同特点是根据某一条件作出判断，因此我们认为虚化了的"还"仅保留了其提出判断的功能，随着句末疑问标记脱落，它便被重新分析为疑问标记。①

（49）蛮奴闻语，回马遂排一左掩右夷阵，索隋家兵士交战。擒虎一见，破颜微笑，问言诸将："还识此阵？"（《敦煌变文集》卷 2）

（50）"……兄弟，行脚人，亦须著些子精神好，汝还知大唐国内无禅师？"……师云："不道无禅，只道无师。"（《祖堂集》卷 16）

（51）他还是你哥哥？（睢宁）（张敏 2013）

（52）你还去打划水去？（句容东昌）（同上）

到南宋《朱子语类》，含有"还"或者"还是"的选择问集中涌现，但"还""还是"并未一开始就占据连词位置，可成对出现 [例（53）（54）]，也可只出现一个，前后句位置不固定 [例（55）—（58）]，这一分异格局和中古时期"为"类标记开始出现在选择问时颇为相似。以例（53）—（55）为代表的句式表明，选择问的"还""还是"不太可能跳过疑问标记环节，直接从"又、复、仍然"义副词"还"发展而来，否则难以解释为何"还""还是"要出现两次或只出现在第一选项句句首。《朱子语类》含有"还""还是"的单标记连接型选择问共 30 例，比重有所上升，双标记结构只有 14 例，"还""还是"居于第一选项句的有 8 例。如今一些汉语方言如陕县话（张邱林 2008）还可使用"还是"双标记句式，保存"还是"发展的历史截面。

（53）使二君与桓文同时，还在其上，还出其下？

（54）"五载一巡狩"，还是一年遍历四方，还是止于一方？

（55）还是切脉底是仁？那脉是仁？

（56）……今程公《春秋》亦如此说滕子。程是绍兴以前文字。不知沙随见此而为之说，还是自见得此意？

（57）哲宗春秋尚富，平日寡言。一旦讲筵说《书》，至"乂用三德"，发问云："只是此三者，还更有？"这也问得无情理。

（58）不须谈空说远，只反诸吾身求之，是实有这个道理？还是无这个道理？

检视《朱子语类》中含有"还""还是"的单标记连接型选择问，会发现其分布语境与中古时期处于同一阶段的"为复""为当"类似。在这30例单标记选择问中，有19例要么嵌套在"不知"之后，如例（56），要么其选项具有内在语义对立关系，比如数量或程度多少、肯定与否定，如例（57）（58）。因此可以认为"还""还是"最初做选择问连接项时，更多出现在选项间有内在对立关系的语境里。不过《朱子语类》选择问也继承了晚唐选择问的发展而有了新的面貌，有19例单标记连接型选择问采用的是[是A][还是B]结构，已和现代汉语无异，既标示了疑问焦点，又有可传疑的连词添加第二选项。至此，我们可

① "还 VP？"这一疑问句式保留在南部中原官话至北部江淮官话的部分方言区（张敏 1990、2013）。

以说类型学中较为特殊的具有传疑作用的连词“还是”，实际上是发展出了连接功能的疑问词，它身兼传疑、连接两种功能，连词身份之后变得更显著。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选择问的类型分化已出现方言分异。[A][还是B]得以形成的基础是先出现了含有“还”的疑问句，而这一用法自南唐起就具有南方口语特征（张美兰 2003）。宋代语料库中集中出现含有“还”“还是”选择问的文献也是具有南方方言背景的《朱子语类》，所以选择问连词“还是”最开始仅是在南方地区流行，之后才被官话吸收。

在汉语之外，一些语言的 [A][x+B] 式选择问中的连词也兼有是非问标记功能，如波兰语的 czy（Swan 2002；Mauri 2008），阿尔巴尼亚语的 a 和 apo（Newmark et al. 1982）。跨语言来看，部分语言的选择问专用连词可追溯至前置性的疑问标记。

四　主流路径之外：后置性单标记选择问的产生

类型4选择问（[A+语气词] [B]）以语气词为关联项，其构式化路径不同于类型3（[A] [连词+B]）、类型5（[A] [是+B]）。从东亚选择问的类型背景看，连接式一般搭配前置性标记，并置式搭配后置性标记，但类型4却是后置语气词“错配”连接式。语气词在语篇中往往以结束项的身份标记一个小句的性质，而无关与其他小句做关联，所以它们很难发展为真正的连词。类型4是一种语法化程度较低的选择问，它来源于[A+语气词][B+语气词]结构，未加入发展“还是”的历史。

根据张安生（2003）和丁勇（2007），与类型 4 选择问较接近的结构在元代文献中有集中记录，如：

（59）客人每，热吃那凉吃？（《老乞大》）[引自丁勇（2007）]

（60）帝一日在华林园内闻虾蚂，问左右：“这叫的为公那为私？”（《直说通略》）（同上）

（61）你可是土居也可是寄居？（《元曲选·薛仁贵》）

以上例句的选项没有明显的分句间隔，它们紧密地出现在一个小句内。其中，“那”的出现频率较高，它原是前一小句的语气词，可见例（62）（63）：

（62）太子怒，说道：“富贵的骄人那，为复贫贱的骄人？”（《直说通略》）[引自丁勇（2007）]

（63）知他如今是死那活那？（《拜月亭》）[引自张安生（2003）]

根据孙锡信（1999）的整理，“那”在元代可出现在是非问、特指问、选择问、反诘问和感叹句句末，标记了命题的非断言特征，不是单纯的是非问疑问语气词。因此，元代文献的类型4选择问不是直接从上古汉语句式[A+疑问语气词][B+疑问语气词]发展来的。

以往研究提到[A+语气词] [B]在元代文献里是一种较有北方特色的选择问。李思明（1983）和张安生（2003）观察到北方金元系白话倾向在选项或分句间使用语气词，而南方平系白话较少使用语气词，更倾向使用前置性标记，如“是”“还是”“却”“却是”“也是”。丁勇（2007）结合考察了元代VP-Neg和VP-Neg-VP两种反复问的编码，把相同场合下南北白话的不同表达方式进行对比，北方白话更倾向使用语气词，比较例（64）和例（65），以及例（66）和例（67）：

（64）事体若何？肯不肯？（南方白话《琵琶记》）[引自丁勇（2007）]

（65）敢也不敢？中也不中？（北方白话《七里滩》）（同上）

（66）知他是去做官不做官？（南方白话《琵琶记》）（同上）

（67）客人每，恁打火那不打火？（北方白话《老乞大》）（同上）

傅惠钧（2011）也发现，基于金元白话的《老乞大》《朴通事》的选择问句在清代版本的《老乞大新释》《朴通事新释谚解》中，要么被去掉语气词、改用关联词，要么被改为特指问：

（68）你船路里来那，旱路里来？（《朴通事》）

（69）你是水路来还是旱路来？（《朴通事新释谚解》）

（70）虚灸那实灸？（《朴通事》）

（71）那太医把艾怎么灸法呢？（《朴通事新释谚解》）

上述现象表明元代北方的金元系白话不仅选择问，连反复问的构式化程度都较低，面对正反两个选项，南方白话已经使用VP-Neg-VP结构，而北方白话还保留了前一选项句的语气词，整个结构并不紧密。与之对应的是，如今汉语西北地区分布着较多使用类型4选择问的方言，它们很可能延续使用着金元系白话的选择问（张安生 2003；张邱林 2009；黄大祥 2015），这些方言的反复问构式化程度同样较低，比如会在VP-neg和VP-neg-V结构的第一个VP后插入语气词（张敏 1990）。

不过，类型4选择问的分布不限于北方方言，它广泛见诸汉语各区。其中，一部分使用类型4选择问的南方方言，如苏州话（李小凡 1998）、天台话（戴昭铭 2006）、石城客家话（曾毅平 2010）、温州话（郑娟曼 2009）等，它们的反复问同样可以在否定项前插入语气词。其他一些南部和中部的方言，虽然也用类型4，但反复问可以不插入语气词。这说明，汉语方言口语一直广泛存在着不使用连词、仅在选项间插入语气词的选择问，这一类型的选择问发展路径容易被先前的研究忽视。

并置是非问是汉语表达选择问的最传统形式，[A+疑问语气词][B+疑问语气词]结构和[A+非疑问语气词][B+非疑问语气词]结构均可产生类型4[A+语气词][B]选择问。汉语典型的连词构式[A+连接项+B]顺应了“连接项居中原则”（Dik 1997：406），这为[A+语气词][B+语气词]紧缩为[A+语气词][B]提供了构式基础。中古时期选择问语气词脱落时，就出现了只保留两个选项间语气词的结构，如第二节的例（25）。但根据何亚南（2001）和刘开骅（2008）对中古文献选择问类型的统计，这类结构占比较少，所以对这一演变趋势的关注也较少。如今部分方言选择问同时存在双语气词和单语气词两种变体，如河津话（史秀菊 2004），永济话（尚童欣 2018），截取到了这两种结构的自然转换阶段。

汉语之外有些东亚语言也使用此类选择问，如居都仡佬语的“A+maŋ^{33} +B”（康忠德 2009），茶堡嘉戎语的“A+ɕi+B”（Jacques 2021）等，在格曼语里甚至还保留着双语气词（A+lai^{55}+B+ lai^{55}）和单语气词（A+lai^{55}+B）的两种结构（李大勤 2002）。这些语言都和汉语一样，语气词是独立的非黏着句法成分，因此可以较为自由地省略。形成对比的是，东亚北部一些语言的疑问标记早已语法化为词缀，较难从[A+疑问标记][B+疑问标记]结构里自由省略，所以它们依然使用双标记的并置式选择问。

从区域分布上看，类型4选择问分布于东亚的中部，出现在选择问南北类型的过渡带。其过渡性表面看上去像是混合了两种选择问结构（连接式+后置性标记），而实际上真正塑造这一过渡格局的因素是用于标记疑问项的成分在东亚南北语言里有“黏着VS自由”的形态区分。一些使用自由后置性标记的语言或汉语方言，可以灵活减省一个标记，发展出贴合连词构式的选择问。

五　总结：从区域类型学视角解读汉语选择问的演变史

类型学视角帮助我们发掘汉语选择问演变的多线脉络。选择问的发展有三个关键步骤：（1）选择问句群内的是非问句脱落疑问语气词，句群变得紧凑；（2）选项句内出现成对的前置性标记，为选择问连词的产生奠定基础；（3）选项句删除重复的标记，发展出单标记选择问，传达疑问和关联选项的功能规约化到单个标记上。顺着这一路径，多变的历史句式被串联到连贯的脉络上，尤其是类型 4 选择问的发掘，使我们注意到主流句式之外的发展支线。历史上，汉语选择问由并置式转变为连接式，最终实现用单个标记就能编码传疑和选择。地理分布上，部分东部、南部方言较早完成转型，但新式句式没有覆盖遍整个汉语区。在其他地区，使用语气词的选择问仍在流行。北方方言中的晋语和部分中原官话，仍使用保守的含有对称语气词的并置式；其他地区，选择问或多或少已经套用连词构式而省去了一个语气词。不过，被官话采纳的“A 还是 B”

可通过文教传播而不受地理条件限制，这一结构已被很多南北方言接受。

综上，汉语方言选择问的类型对立呈现非对称的交错过渡性。最保守的结构分布区较小，集中在北方方言晋语区和部分中原官话区；而最新式的和混合型的结构分布较广。最新式的结构在东部、南部方言最集中，不过“A 还是 B”可离散分布在其他各方言区。带有混合特征的结构不仅分布在过渡地带，在东部和南部方言也出现，在远离东南方言的西北、西南地区也广泛使用。选择问类型虽未表现出和语序结构类型一样显著的“南北-旧新”推移链（桥本万太郎 1985），但其地理分布也能反映一定的历史层次渐变。

从更大的区域背景看，东亚语言的类型差异可为汉语发展出选择问专用连词提供部分动因阐释。东亚北部语言几乎没有发展出选择问连词，而东部和南部的语言则流行在选择问里使用连词。Tsunoda et al.（1995）指出 SOV 语后置词（postposition）容易形态化为后缀，而 SVO 语前置词（preposition）更能保持词的独立身份，从而可能发展为其他独立句子成分。本文所采样的南部和东部语言大多是 VO 语，汉语的基本语序也是 VO。汉语历史上出现过的前置性选择问标记如“为”类词、“是”、“还”和“还是”等，都是非黏着自由成分，可以在对称双标记结构中灵活省略。再加上 VO 语里典型的连词都是前置性的，汉语也不例外，因此出现在选项间的单个前置性标记就很容易被重新分析为连词。反观东亚北部和西部的语言，大多为 OV 语，选项句采用后置性标记，有的甚至已经语法化为词缀，难以被重新分析为独立的连词。

最后，区域类型学呈现了选择问的宏观类型对立和微观类型共存，可以借鉴此视角来观察选择问的历史演变。共时的宏观对比旨在呈现汉语方言选择问有哪些类型大本营。从微观视角视之，多种选择问结构会在同一方言共存，但是方言选择问变体的数量和种类不是随机的、无限的，它们在地理分布上有一定的连续性，比如东南部方言就不会大规模出现类型 1、2 变体。与之对应，某一时期的历史文本会包含多类选择问变体，比如中古《三国志》存在类型 6、1、2 和 5，晚唐《祖堂集》有类型 2 和 5，南宋《朱子语类》有类型 2、3 和 5。不过，这种类型共存不是无规律的，它们大都按照“并置式 + 对称后置标记——并置式 + 对称后置标记 + 对称固定前置标记 / 连接式 + 单个后置标记——并置式 + 对称固定前置标记——连接式 + 单个前置标记”这一演变链呈现类型多样性，即同一文献中共存的选择问句式涵盖的是链条上连续的一段。各代文本续接在一起可以构建出宏观的选择问句式变迁史。新旧结构的共存是常态，只有在较大的宏观历史跨度里，才能观察到主流选择问句式的更迭。

参考文献

戴昭铭（2006）《天台方言研究》，中华书局，北京。

丁声树等（1961）《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北京。

丁　勇（2007）《元代汉语句法专题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傅惠钧（2011）《明清汉语疑问句研究》，商务印书馆，北京。

甘于恩（2010）闽方言（福州话）疑问范畴研究，《汉语方言疑问范畴比较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广州。

郭利霞（2015）《汉语方言疑问句比较研究——以晋陕蒙三地为例》，南开大学出版社，天津。

郭　锐（2008）语义结构和汉语虚词语义分析，《世界汉语教学》第 4 期。

何亚南（2001）《〈三国志〉和裴注句法专题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南京。

何亚南、张爱丽（2004）中古汉语疑问句中“为”字的词性及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6 期。

胡明扬（1987）《北京话初探》，商务印书馆，北京。

黄伯荣（1984）《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

黄大祥（2015）甘肃民勤方言的语气词“莽”“门”及其来源，《河西学院学报》第 3 期。

黄淑芬（2008）《漳州方言连词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江　洁（2015）《建瓯方言语法专题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金　美（2003）哈尔滨方言中的选择问句，《汉字文化》第 2 期。
康忠德（2009）《居都仡佬语参考语法》，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李崇兴（1990）选择问记号“还是”的来历，《语言研究》第 2 期。
李大勤（2002）《格曼语研究》，民族出版社，北京。
李改样（2005）山西方言的疑问句，《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3 期。
李思明（1983）从变文、元杂剧、《水浒》、《红楼梦》看选择问句的发展，《语言研究》第 2 期。
李文龙、万晓卉（2012）新疆汉语方言中表选择的“ma”，《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 期。
李小凡（1998）《苏州方言语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
李宇明（1997）疑问标记的复用及标记功能的衰变，《中国语文》第 2 期。
李云兵编著（2000）《拉基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北京。
力提甫·托乎提（2012）《现代维吾尔语参考语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梁　敏编著（1980）《侗语简志》，民族出版社，北京。
林　焘（1987）北京官话溯源，《中国语文》第 3 期。
刘　坚等（1992）《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语文出版社，北京。
刘开骅（2008）选择问句疑问语气词脱落的历时轨迹与内在动因，《合肥师范学院学报》第 5 期。
刘子瑜（1994）敦煌变文中的选择疑问句式，《古汉语研究》第 4 期。
刘子瑜（2005）汉语选择问句历史发展研究述评，《汉语史学报》第五辑，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
柳士镇（1986）《世说新语》句法特点初探，《语言研究集刊》第一辑，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
柳士镇（1992）《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南京大学出版社，南京。
陆俭明（1984）关于现代汉语里的疑问语气词，《中国语文》第 5 期。
罗安源（2005）《松桃苗话描写语法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北京。
吕叔湘（1942/1982）《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北京。
梅祖麟（1978）现代汉语选择问句法的来源，《“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九本第一分，“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
彭小川（2010）粤方言（广州话）疑问范畴研究，《汉语方言疑问范畴比较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广州。
桥本万太郎（1985）《语言地理类型学》，余志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
尚童欣（2018）永济方言疑问句研究，《汉字文化》第 16 期。
史素芬（2002）山西武乡方言的选择问句，《语文研究》第 2 期。
史秀菊（2004）《河津方言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
孙锡信（1999）《近代汉语语气词——汉语语气词的历史考察》，语文出版社，北京。
唐爱华（2005）《宿松方言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
王　力（1937）中国文法中的系词，《清华学报》第 1 期。
吴　媛、韩宝育（2016）《岐山方言调查研究》，中华书局，北京。
项梦冰（1997）《连城客家话语法研究》，语文出版社，北京。
邢向东、王兆富（2014）《吴堡方言调查研究》，中华书局，北京。
徐　杰（1999）疑问范畴与疑问句式，《语言研究》第 2 期。
徐　杰（2001）《普遍语法原则与汉语语法现象》，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
杨如雪（1998）《支谦与鸠摩罗什译经疑问句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叶建军（2008）疑问副词“还”溯源，《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1 期。

袁毓林（1993）正反问句及相关的类型学参项，《中国语文》第 2 期。
曾毅平（2010）客家方言（石城话）疑问范畴研究，《汉语方言疑问范畴比较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广州。
张安生（2003）宁夏同心话的选择性问句——兼论西北方言“X 吗 Y”句式的来历，《方言》第 1 期。
张美兰（2003）《〈祖堂集〉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北京。
张　敏（1990）《汉语方言反复问句的类型学研究：共时分布及其历时蕴含》，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张　敏（2013）江淮官话中的句法变化：地理分布如何揭示扩散的历史，孙志阳译、吴福祥校，《境外汉语历史语法研究文选》，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
张邱林（2008）陕县方言的选择问句，《21 世纪汉语方言语法新探索——第三届汉语方言语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广州。
张邱林（2009）陕县方言选择问句里的语气助词“曼”——兼论西北方言选择问句里的“曼”类助词，《汉语学报》第 2 期。
赵学玲（2007）山东章丘方言的疑问句及疑问语气词，《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6 期。
郑娟曼（2009）温州方言的疑问句，《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 期。
周本良（2005）《临桂义宁话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南宁。
朱德熙（1982）《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北京。
朱艳华（2011）《载瓦语参考语法》，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祝敏彻（1995）汉语选择问、正反问的历史发展，《语言研究》第 2 期。
Beck, S. and Kim S.-S. (2006) Intervention effects in alternative questions. *Th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Germanic Linguistics* 9(3): 165–208.
Chao, Y. R.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omrie, B. (2007) Areal typology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What we learn from the WALS maps. *Manusya: Journal of Humanities* 10(3): 18–47.
Dik, S. C. (1997) *The Theory of Functional Grammar Part 1: The Structure of the Clause*.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Dixon, R. M. W. (2012) *Basic Linguistic Theory: Volume 3, Further Grammatical Top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n, C. and Romero M. (2004) Disjunction, focus, and scope. *Linguistic Inquiry* 35(2): 179–217.
Haspelmath, M. (2004) *Coordinating Construction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Jacques, G. (2021) *A Grammar of Japhug*. Berlin: Language Science Press.
King, J. T. (2009) *A Grammar of Dhimal*. Leiden: Brill.
Li, X. (2024) A typology of alternative questions in Chinese and other East Asian language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Online-First Articles*.
Luo, T. (2013) *Interrogative Strategies: An Areal Typology of the Languages of China*. University of Konstanz. (Ph.D. Dissertation)
Mauri, C. (2008) The irreality of alternatives: Towards a typology of disjunction. *Studies in Language* 32(1): 22–55.
Morey, S. (2005) *The Tai languages of Assam: A Grammar and Texts*. Pacific Linguistics,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and Asian Studie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Newmark, L., Hubbard P. and Prifti P. (1982) *Standard Albanian: A Reference Grammar for Student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Norman, J. (1997) Some thoughts on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Mandarin. In Anne Yue-Hashimoto and Endo Tamaki (eds.), *Hashimoto Mantarō Inen: Chkūgokugogaku Ronshū*, 21–28. Tokyo: Uchiyama Shoten.
Pruitt, K. and Roelofsen F. (2011) Disjunctive questions: Prosody, syntax, and semantics. A seminar, Georg August Universität Göttingen.
Swan, O. E. (2002) *A Grammar of Contemporary Polish*. Bloomington: Slavica Publishers.

Tsunoda, T., Ueda S. and Itoh Y. (1995) Adpositions in word-order typology. *Linguistics* 33(4): 741–761.

Zhan, F. and Sun C. (2013) A copula analysis of shì in the Chinese cleft constructi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4(4): 755–789.

Zhang, P. (2013) *The Kilen Language of Manchuria: Grammar of a Moribund Tungusic Languag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h.D. Dissertation)

Zimmermann, T. E. (2000) Free choice disjunction and epistemic possibility.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8(4): 255–290.

Constructing Multiple Development Paths for Sinitic Alternative Questions from a Regional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LI Xinyi

Abstract: In the eastern and southern areas of East Asian, alternative questions commonly employ a conjunction, such as *Haishi* (还是) in Standard Mandarin, to link the alternatives.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western and northern regions, alternative questions are typically formed by juxtaposing alternatives respectively marked with interrogative markers. The distribution of alternative question types in Sinitic languages reflects the above general division since Sinitic languages cover the transitional region between the two distinct areas in East Asia. Based on a comparison of alternative questions in East Asia, three essential steps for constructionalizing Sinitic alternative questions can be identified: (1) a group of sentences is transformed into a complex sentence structure; (2) a prepositive marker is adopted in each alternative clause; (3) repeated markers are reduced, and the remaining marker between the two alternatives may develop into a connector, resulting in a shift from a juxtaposition structure to a coordinated structure. The origin of *Haishi* (还是)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prepositive marker used in polar questions. This trajectory is supported by historical evidence found in other prepositive question markers. The typological exploration not only reveals multiple evolutionary trajectories of Chinese alternative questions but also provides typological explanations for the emergence of specific question patterns.

Keywords: alternative question, typology, *Haishi* (还是) , question

999077 香港，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 xlifs@connect.ust.hk